

文 论 小 集

刘 泮 溪 著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文 論 小 集

刘 泮 溪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經 9 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 2901

开本 787×1092公厘 1/32·印張 5 3/4·插頁 2·字數 112,000

1959年10月第 1 版 1959年10月第 1 次印刷

印放: 1—10,000

統一書号: 10099·762

定 价: (G) 0.48 元

目 录

学习毛主席的語言.....	1
正确对待民族文学遺產.....	10
在民族形式問題上胡风所表現的 反馬克思主义的观点.....	16
从陆侃如的“現代的中国詩”一文批判起.....	40
瞿秋白論文学发展过程.....	50
瞿秋白的“餓乡紀程”和“赤都心史”.....	82
魯迅論文学艺术的几个基本問題.....	102
魯迅的“朝花夕拾”.....	126
紀念魯迅，要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36
魯迅和資产階級文艺思想斗争的现实意义.....	143
保卫毛主席所确定的文艺方針.....	156
向大跃进中的新民歌学习.....	165
后 記.....	179

学习毛主席的語言

学习毛澤东主席那种把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思想，以提高政治水平、思想水平，已成为我們經常的必修課。但是学习毛主席的語言，却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視。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的社論上，談到：“正确地使用祖国語言，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争！”时，曾号召大家在这方面，要向毛主席学习。話是这样說的：

“我国現代語言保存了我国語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語汇成分和語法成分。因此我国現代語言是比古代語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現力了。毛澤东同志和魯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語言的模范。在他們的著作中，表現了我国現代語的最熟練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給了我們在語言方面許多重要的指示。我們应当努力学习毛澤东同志和魯迅先生，繼續发揚我国語言的光輝传统。”

第四十九期文艺报編輯室談話，也認為在毛主席的著作中，“常常用极其平易的形式，生动地表現了极深刻的思想內容。……每一句話都能簡炼、准确、生动、有力地传达了深湛的思想并飽和着丰富的感情”。的确，我們一和毛主席的言論著作相接触，立刻被其中那种邏輯力量和說服力量所吸

引，感到其中一言一語，都象經過千錘百煉，銳不可當。正如俄國羣眾贊美列寧的講演時所說的：“簡直是一種萬能的觸角；好象是用螯子從各方面把你鉗住，使你無法逃脫出去！”（斯大林：“論列寧”）為了從毛主席語言的運用上更好地學習毛主席的思想；為了鍛煉正確使用祖國語言的能力，以端正在文章中的一些不正確的作風；更為了掌握宣傳教育的武器，大力向羣眾灌輸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的思想教育，並與人們意識中從舊社會帶來的壞思想壞影響作鬥爭：學習毛主席的語言，就有迫切的現實的意義。

學習毛主席的語言，是不能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截然劃分的。斯大林在“論語言學底幾個問題”里面說：“不論人的頭腦中會產生什麼樣的思想，它只有在語言材料底基礎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底基礎上才能產生和存在。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語言是思想底直接現實’（馬克思），思想底真實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語言是直接與思想聯系的，毛主席的思想是由毛主席的語言表達出來的，他那語言的邏輯力量與語法的精密謹嚴是與他的思想方法分不開的，而語言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則是植根於他那豐富多彩的革命思想和事業。毛主席的思想和他的語言密切結合起來，形成了有機的統一，形成了毛主席言論著作的風格。

首先應該認識到的是：毛主席語言的運用視戰鬥的目的與任務而定，把語言與思想鬥爭、革命鬥爭密切聯繫起來。因此他所有的言論著作，可說毫無例外的都是從實際出發，

从革命实际的迫切要求出发，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是在用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問題。以下举出几个特別具有說服力量及感动力量的例子：

在一九二七年，毛主席为答复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責难，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篇第一段，就描述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兴起，他預見到：“很短的时期內，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們将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坟墓”。毛主席根据三十二天調查的結果，确信在工人階級领导下組織起来的农民力量的壮大，这种壮大的革命力量足以摧毁一切反动势力，建立起新的革命秩序。通篇的文字都是貫穿着这种精神。这篇报告，是中国革命主力由城市轉入农村的行动指針，正确的革命方針由饱和着政治热情的形象的語言表現出来，对那些怀疑农民革命斗争的力量的人，发生了巨大的說服力量。

当一九二九年左右，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毛主席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為批判当时党内这种悲觀思想，写了一篇通信，题目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在这里面分析了当时中国一系列的矛盾，說明了工农紅軍、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理由，滿有信心地指出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在通信的結尾說：“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远看东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紅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嬰兒。”这在当时一般革命同志的心中是发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的。即使我們現在讀到它，也还是被它那种深湛的思想力量和生动的形象的言詞所激动。

一九四〇年在所著“新民主主义論”中，駁斥頑固派叫共产党把共产主义收起时說：“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館的东西了。資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館（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館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保其美妙之青春。”这是对頑固派及其所支持的封建主义資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給以有力的打击，同时是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所唱出的一支贊歌。

看了以上这些例子，我們可以晓得毛主席在完成宣传和斗争的任务时，时常运用着形象化的語言，这种語言的說服力量感人力量，是和他的阶级立場的坚定，对中国革命規律的掌握，对革命生活的深刻体验，对敌人的仇視蔑視，对人民力量和革命胜利的确信，对羣众教育的責任感，以及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革命的乐观主义分不开的。假若离开生活形象与斗争形象专求語言的形象化，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主席的語言，恰切地表現了他那使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思想。毛主席的語言也可說是一种宣传武器，这个武器越鋒利，它所表現的思想方向就越正确，就越是所向无敌。

其次，毛主席的語言，是根据多年的革命經驗以及羣众工作的要求而丰富起来的，其中有不少成份是从羣众語言中提炼出来的。一九四二年他在“反对党八股”中，針对着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語言无味象个癩三——他对症下葯地說：“第一，要学习人民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現实际生活的。这种語言，我們很多人沒有学到，所以我們在写文章做演說时，沒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象癩三一样，瘦得难看，不象一个健康的人……。”他又說：“学习各种語言中，特別是人民的語言要用功学习，人民語言中，又特別是工农兵羣众的語言要用功学习。如果我們不学习羣众的語言，我們就不能領導羣众。”毛主席叫別人做的，他自己是以身作則地做到了。無論多么高深的道理，叫他一講，就明显易解。例如早在一九二七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用极生动平淺的說法解释革命的大道理，以駁斥一般人認為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时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画綉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样溫良恭俭讓。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

权力。农村中須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羣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至于人民大众所創造的諺語、比喻等，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更是經常的运用着。例如一九四一年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指出：“象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則对于国内国际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对于国内国际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还没有有系統的研究时，他說滿足于一知半解，粗枝大叶，夸夸其談的人是象：“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对于沒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誦教条的人，对于徒有虛名并无实学的人，对于向馬列主义开玩笑的人”，他送他們一首对子：“牆上蘆葦，头重脚輕根底浅；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在“反对党八股”中，講到說話要看对象时，他說：“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飯，量体裁衣”。批評离开中国实际需要来談馬克思主义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也还是一个“老鼠上秤鉤，自己称自己”的假理論家。

在“論联合政府”中，說国民党反动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謂“国民大会”，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一条繩索，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毛主席的語言的显而易解之处，是受过羣众語言的影响，是在革命工作中不断向羣众作宣传教育同时又向羣众学习所得到的結果，他既作羣众的先生又作羣众的学生。毛主席的言論著作中的思想之所以为羣众易于理解，正确掌握，指导了千千万万人民的革命事业，产生了巨大的物質力量，其中

除了馬列主义思想的力量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便是他对于羣众語言的掌握运用。

再者，語言是言論著作的生产工具，它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为了充实我們的語汇，使我們的文章变得生动活泼，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更好的为中国革命服务，不但活在人民口头上的諺語比喻可以吸收，“古人的語言的宝庫还可以发掘，只要是还有生气的东西我們就應該吸收，用以丰富我們的文章、演說和講話。”（“反对党八股”）有些古人的成語，本来已經失去了生命，埋藏在典籍里暗淡无光，可是經過毛主席一引用，吹入了一种新生命，加以創造，使它表現新的内容和意义，便获得了新的力量，增强了民族色彩。

“矫枉过正”原意是糾正錯誤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这是从前提倡中庸之道的“正人君子”拘束人們大胆創造活动的語言，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說“每个农村都必須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决不能鎮压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紳权。矫枉必須过正，非过正不能矫枉。”按照“毛澤东选集”的注释，“就是說，要終結旧的封建秩序，必須用羣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这句成語本来是比喻軍事上的行动。毛主席把古人从实际經驗中得来的箴言，用来闡发他那“实践論”的中心思想說：“这句话对于人們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認識論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一九四一年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这个

成語作了全新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

在“反對黨八股”中，把“對牛彈琴”給予了一種新的意義，借以譏刺寫文章做演說不看讀者不管聽眾的人。說：“‘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簡直是老鴉聲調，却偏要向人民羣眾哇哇地叫”。

為了發揮自我批評的真諦，他引用了一系列的古人的格言：“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他們在不停止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的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錯誤、缺點這類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與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論聯合政府”）

从毛主席對於古人這些成語的活的運用，我們感到毛主席學問的淵深，但他應用這些成語的目的，並非眩耀自己的博學，他吸收古人這些“好的合理的东西”，還是為了使思想表達得更加明確具體，使真理發揮得更加透辟，對羣眾發生更大的宣傳教育作用。

根据以上所說的，可以对毛主席如何运用語言得到一个大概的概念。当然，毛主席語言的优点，不仅是这些，这不能包括他那語言特色的全部，現在不过就我所体会到的提出来，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希望有人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毛主席的言論著作，虽然和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学創作不一样，但就其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針政策，以及在革命中所尽的宣传鼓动作用來說，就其語言的正确生动純潔健康与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來說，可說是高度的政治內容与民族形式的統一。毛主席的思想的實質和精神，惟有由毛主席的語言可以表現出来。因此学习了他的語言，然后才能更深刻了解他那思想的伟大。

現在正值全国知識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热烈展开，在这运动的过程中，我們首先就要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武器，彻底批判反动的落后的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资产階級思想的影响和它所引起的危害作用。只有在批判旧思想的过程中，才能树立起新的思想、新的文风，使我們的思想意識更好地为新社会的建設服务。而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認真学习毛主席的語言，是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一九五二年一月

正确对待民族文学遗产

胡适、胡风等对于民族文化遗产，有一种共同的态度：不是一笔抹杀，把它看成“鬼”与“妖”，看成封建糟粕，就是阉割了古典作品中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替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作宣传。例如胡适、俞平伯曲解“红楼梦”，认为它的真价值在于“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其主要观念是梦幻色空。胡风则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也只不过是把女人当人、当社会人来描写。胡适把“水浒传”中的一些英雄人物诬蔑为“强盗”，俞平伯把它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胡风则认为那里面没有“发自贰心的叛逆之音”。他们这样诬蔑民族文化遗产的企图，是使中国人民丧失自信心，认为我们祖先在文化方面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只好从外国“移植”。这种居心是恶毒的，它传播着一种反爱国主义的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观点。

我们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正和他们相反，我们认为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必须继承下来，因为它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有很大的用处。恐怕有人要问：我们现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许多革命理论书籍和革命文学作品，为什么还要过去的文化遗产？古诗和章回小说里面，并没有社会主义色彩，也没有保尔或卓娅的形

象，讀它們有什麼用處呢？誠然，在文化遺產中，在古典文學作品中，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社會主義新人的英雄形象和道德品質，但是其中卻包含有愛國主義思想，人道主義思想和民主思想，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和願望。產生這種作品的時代雖然一去不復返了，可是作品中的這種思想和精神，仍能激勵我們前進，使我們受到一種愛國主義教育，雖然它不能代替現代的作品。進一步說，這種寶貴的遺產，原是勞動人民在生產與鬥爭方面的智慧、經驗的長期積累與總結。我們現在的一切成就，是與他們的鬥爭、創造分不開的。正如毛主席所說：“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不懂得中國的昨天，也就不能更好地懂得中國的今天。這問題，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一文中也早已昭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空中掉下來的……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積累之有規律的發展。”這也就是說，必須繼承和改造過去一切文化財富，聯繫着新的任務與新的生活內容來發展它們，社會主義文化才能創造出來。蘇聯在這方面的經驗給了我們充分的證明。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也只有確切地通曉民族文化遺產，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加以批判、改造和吸收，使之發揚光大，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結合起來，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實結合起來，才能達到目的。假若和民族文化遺產割斷聯繫，想平地一聲

雷，就創造出社会主义的文化来，即使現代的“齐天大圣”出現，也是断然办不到的。

明确了繼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就要談到如何繼承的問題。我們所要繼承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主要應該包含着两种成分：一种是劳动人民自己創造的，另一种是进步文人的作品。不論对于哪一种，在我們繼承的时候，都不能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須“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下想从文艺方面加以說明。

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优秀創作，都有着深刻的人民性。不論歌謠諺語也好，傳說故事也好，曲艺及地方戏也好，虽然在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可是都表現了生活的真实，暴露了反动統治階級的丑恶、残暴，歌頌了劳动人民的机智、勇敢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象“水滸传”：“吳用智取生辰綱”一回中白胜所唱：“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孙把扇搖。”几句话就表現出了农民和地主貴族尖銳的对立，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階級矛盾。象“白蛇传”，反映了受压迫妇女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反映了妇女要求自由幸福的愿望。白蛇和法海的矛盾，具体表現出爭取自由解放的妇女和封建势力的矛盾。白蛇对法海的斗争，正显示出中国妇女反封建斗争的坚强意志，實質上也代表了农民革命的要求。这不用說都是属于民主性的精华，是值得吸取发揚，和可以作为創作时的借鉴的。

在階級社会里，反动統治階級的文化占統治的地位，劳动人民的文化則处处受到压迫，得不到自由发展，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被封建文化滲進了一些毒素。象過去關於“白蛇”的傳說中，有的就歪曲了許仙的形象，過分強調了許仙對白娘子的懷疑和不忠實，強調了白蛇和許仙的糾紛，以致削弱了白蛇和法海的矛盾。這顯然是受了反動統治階級文化的侵蝕，是必須加以批判的。

有些上流社會的文人一旦傾向了人民，熱愛了人民的生活與藝術，掌握了能正確反映現實的創作方法，他也能寫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來。“水滸傳”就是進步作家施耐庵根據流行在勞動人民中間的水滸故事經過加工寫成的。它深刻反映了當時農民和官僚地主的對立，熱烈歌頌了人民的正義反抗，它在人民中間留下的革命影響是巨大的。這自然引起了反動統治階級的嫉視，於是就有御用文人金聖嘆出來，站在幫閑幫凶的立場，把原來的水滸篡改和腰斬，讓玉麒麟盧俊義作夢，夢着張叔夜把這羣水滸英雄縛起來，一個個都杀掉。（指過去流行的七十回本，加楔子為七十一回）這也是反動統治階級的意識通過作者以外的力量，影響進步作品的顯明事例。我們要批判的正是這些反人民的毒素，所要發揚的則是英雄們的反抗鬥爭精神。

過去有不少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家，因所屬階級和宇宙觀的限制，在他那正確反映了社會矛盾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些封建思想的糟粕，如頌揚君主，出世思想，因果報應等等。唐朝大詩人杜甫給我們留下了許多不朽的詩篇。象“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對社會現實的藝術概

括，深刻揭露了天宝年間社会的主要矛盾，控訴了造成人民苦难的社会根源，引起人們对封建剝削制度的憎惡，是富有积极的政治作用与教育意义的。可是在他的詩篇里也存在着象“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天顏有喜近臣知”一类的詩句。我們不能說杜甫不應該有忠君思想，也不應該拿我們今天的思想來要求杜甫，但是在今天对待“天顏有喜近臣知”，“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这类詩句时，就應該認清它的思想實質。这并不損減杜甫的伟大，也掩盖不了他那作品中所具有的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光輝。

在中国丰富的文学遺產当中，不仅它那爱国主义与民主思想值得繼承与發揚，同时它那现实主义的精神与写作技巧也值得借鉴。象民間創作中那种剛健清新的风格和勇于揭露社会矛盾的精神，古典作品中那种正确描写现实和典型化的方法，那种在艺术技巧上达到可惊的准确与精練的程度，是必須研究和学习的。象“水滸傳”与“紅樓夢”等書中，写了几十几百的人物，个个性格突出，一提起某一个人物来，那人物的形象立刻在我們眼前出現；同时这些人物又各具有他所屬阶层的一般特征。这是由于作者进行概括、塑造形象及刻划性格的工力所致。而在語言的运用上，也都做到了精練、准确、生动逼人。在中国过去一系列的优秀的文学作品里面，确实蘊有无限宝藏，值得我們認真发掘。

文学遺產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怎样才能把精华与糟粕区别开来，不至把糟粕当成精华，把精华当成糟粕呢？这与立場、观点有密切关系。象胡适、胡风他們那种抹杀民族文